臺大歷史學報第27期
2001年6月，頁125~149

BIBLID1012-8514(2001)27p.125~149

# 西方史家對所謂「儒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

汪榮祖*

## 提　要

西方著名史家，包括一些中國通在內，稱中國傳統史學為「儒家史學」，是一種以道德裁判為政治服務的史學，所成的史書只不過是由官員寫給別的官員看。西方史家根據此一認識，斷言中國傳統史家既不知歷史的客觀性，也不具真正的歷史意識。

此種認識顯然基於西方的偏見以及對中國傳統史學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指出，中國傳統史家從司馬遷與班固始，並未使用春秋筆法，直到北宋的歐陽修和南宋的朱熹，才講義類凡例，只是少數的例子而已。殊不足以春秋褒貶來概括中國傳統史學。即使春秋筆法，固然標榜儒家倫理，為尊者諱，並未漠視歷史真相，可為諱而不隱的筆法。

西方史家對於中國史官制度，也多誤解，認為官修既代表官方立場，必具官方的偏見，乃是官方的傳聲筒，無個人獨立的觀點與立場，專為儒家教條與官僚體系服務。本文指出，較有組織的官修始於唐朝，歷朝隔代修史，固有政治意義，如正統的繼承，然絕非貶前朝而褒今朝，而是為了隔代較為客觀。官修掌握大量史料絕非私修可及，其理想仍然是尊直筆，責曲筆，更何況尚有「天子不觀史」的傳統，亦欲保持歷史的真相。若以史官制度貶低中國舊史的真實性，更忽略了中國史家曾表現出來的烈士性格。求真仍是史官莊嚴的職責，未必會犧牲史職。

至於說中國傳統史學有史而無學，只能收編史料，殊乏辨別真偽的能力，沒有綜合與解釋的技藝，也非公平之論。編排史料絕非中國傳統史學的範式，劉知幾所謂才學識乃是典範。若僅編排史料，何須才學識？以正史為主的中國舊史固重敘事，但別有豐富的釋史、評史與考史之作。

西方史家之偏見，一方面由於以近代史學的標準論中國舊史，另一方面由於對中國舊史認識之不足。前者顯然不公，後者則中國傳統史學之研究顯然不足，中國近現代史家亦有職焉。

關鍵詞：西方史家　誤解儒家史學　理解中國傳統史學

---

* 作者係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引言
二、對褒貶的認識與誤解
三、對史官制度的認識與誤解
四、對中國傳統史書的認識與誤解
五、結語

## 一、引言

西方學者泛稱中國傳統史學為「儒家史學」，就像他們視二千餘年的帝制中國為儒教中國一樣，因他們以儒家為哲學或宗教，以及視為一種意識型態，並預設前提，認為儒教乃籠罩帝制中國，無所不在的精神面貌。其實，儒家主要教導做人的道理，提出人倫規範與社會秩序，與極權專制並不協調；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帝制實賴法家維持，儒家最多起了制約法家的作用而已，以至於朱熹有所謂聖人之道未嘗一日真正行於天地間之說。何炳棣研究的結論，也認為儒教不論其高貴的價值與人道的效果，一直是傳統中國高度極權政權的工具，而非主宰。[1]如果儒家道德主宰不了帝制，又如何主宰史學？然而西方史家往往斷言，中國傳統史學乃儒家道德的工具，帝國政府更通過史官制度，掌控朝代史的撰寫，為實際政治服務，並欲達到勸善懲惡之目的。其結果使中國歷史難以信實，無從創作，不能獨立成學，沒有產生西方素有的史學意識。

近代西方獨霸世界，在學術圈裡也不免有文化的天朝觀，認為一切現代學術的根源都在西方，所有非西方學術，莫不屬於前現代的古文明。所以，不少著名的西方史學家，雖不曾真正接觸到中國傳統史學，就信心滿滿地說，歷史意識（historical-mindedne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乃西方獨有的東西，故史學史必須追溯到希臘與猶太之

1 Ping-ti Ho,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無論印度或中國皆屬「無史」（a-historical）。[2]有不少西方史家認為，西方人到十九世紀之具有近代史學意識，就像他們於十七世紀已具備了科學意識一樣，而亞非文明在過去既無歷史意識，至近代歐化，才接受了近代西方的科技，以及獲致近代西方的史學意識，並以歐洲的史學概念與名詞來重新規劃亞非國家的歷史。[3]

一位頗享盛名的英國史家感慨的說，西方人對歷史感興趣，對歷史價值有信念，純從歷史背景與觀點看往事，甚為自然之事，然而在中國或印度卻找不到同道。[4]所以結論是，史學意識與科學方法都是近三四百年西方的重要發展，「史學思想」（historical thinking）根本是特殊的歐洲或西方產物，像「印度、中國、波斯、日本等國的可靠歷史都是西方人所寫」，又說「直到現在，西方人可以忽略東方歷史，而無損於對史學的正確理解；然而有知識的東方人，卻不能再無視西方，特別是歐洲的歷史」。[5]這種不通漢文的西方史學家所下結論，當然不能被稍事涉獵中國史學的西方漢學家所認同，翻譯司馬遷《史記》的華真（Burton Watson）即謂，中國的歷史意識源自周代的人文主義。[6]周代乃中國之上古，歷史意識在中國上古已有之，何待近三四百年的西方特殊產物？這兩種說法，正是南轅北轍，結論完全相反。

西方諸名家認為史學意識乃西方所獨有者，並不是說非西方世界沒有歷史，而是缺少意識；由於意識低，所以史書的質量低劣，諸如缺乏批判求真的精神，只能寫真偽莫辨的大事紀，或錯落不足的載記，以及寫作的目的主要為宗教或政治服務等等。就中國而言，西方史家認為中國舊史沒有史學觀念，並不是說中國人不重視史事的紀錄與保存，他們

2 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Crowell Co, 1967), 11.

3 John Lukac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Remembered Past*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Book, 1994), 15~29.

4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Blackwell, 1962), 97

5 John Lukac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Remembered Past,* 23

6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 1958), 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少都知道中國歷史悠久，卷帙浩繁，所以「國亡史存」的傳統，[7]對他們而言，並不能證明具有歷史觀念。他們所謂的歷史觀念，包括對歷史真相的執著，歷史演變軌跡的呈現，以及對歷史的綜合與解釋。事實上，這些歷史觀念在西方舊史並不彰顯，直至近代才發達；現代西方史家顯然將中國傳統史學歸之於前近代。他們自傲的史學也是蘭克以來的近代西方史學。他們以近代西方史學的眼光來看中國舊史，益之以對中國舊史理解之有限；不懂漢語的西方史家固不必論，即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史家，專治一端，也難能掌握整個中國史學傳統，更難深入，而西方文字中尚無一本較為詳盡的中國史學史之作。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中國學者本身對傳統史學的嚴酷批評，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驟下片面的定論，也就不足為奇。

西方史家對所謂「儒家史學」的具體批評，不外認為主觀的褒貶有違客觀；御用史官替政治服務，失之真實；編鈔史書無異剪貼簿，枯燥無趣。茲就此三要項，作一分析與評述。

## 二、對褒貶的認識與誤解

西方史家包括專治中國史的漢學家在內，確認中國舊史為儒家史學，主要因為孔子修《春秋》，講究大義，對歷史人物作褒貶，使亂臣賊子懼，充滿道德色彩，於是認為在孔子春秋大義的影響下，中國傳統史家莫不以褒貶為寫史的準則，以歷史為儒家政治倫理的鏡子。[8]按此邏輯，儒家既講究倫理道德，中國傳統史學便無法不受到儒家德目的主導，就像基督史學受到基督教義主導一樣，不免作主觀的道德裁判，因而缺乏史學應有的客觀，也就令中國史學缺乏獨立意識，歷史於是專為儒家教條服務，喪失了自主性。

---

7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52~55。

8 Herbert Franke,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種認識下，即使大史家司馬遷的《史記》，雖不能說是大而無當，卒不免「講道德遠多於敘史」（[His book] is more a narrative of morality than a narrative of history），[9]歷史不過是過去道德好壞的例子，為現在和未來作榜樣。漢學家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也認為，中國的歷史紀錄主要是為了勸善懲惡的目的，[10]而此一目的乃中國歷史寫作的最大弱點。[11]所以西方人認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歷史只是為了善善惡惡，壞人必得懲罰，好人必有善報，正義必勝，以「胸有成竹」（equanimity, imperturbability）來形容中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12]換言之，既然善善惡惡已經命定，大可高枕無憂，不必關注歷史上的邪惡與災難，顯然不符歷史的真相。這當然是一種嘲諷，因此依英國史家波侖姆（J. H. Plumb）之見，中國舊史沒有史學批判（historical criticism）可言，不知古今之異，但以史為道德之鑒，以便不違孔子之教。[13]

西方史家雖將中國傳統史學等同儒家史學，然而對所謂「儒家史學」的內涵與本質，實不甚了了。英國著名史家白德非爾（Herbert Butterfield）在其《史源》（The Origins of History）一書中，固然專章論述中國史學的獨立起源，並淵源流長，他認識到《尚書》乃上古政書與帝王訓令等文獻的彙編，編輯者顯然具有道德教訓之意，為政治與史學的引導，但他不能夠理解，像《春秋》這樣枯燥與簡陋的編年紀，怎麼可能出自孔子之手？[14]

《春秋》一書可說是中國編年史的草創，與西方上古的編年史一樣

9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69), 22.

10 Edwin 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143.

11 Earl H. Pritchard,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Local Histories," in Hayden V. White ed., *The Uses of History: Essays i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Detrio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1.

12 A.G. Widgery,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From Confucius to Toynbe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1), 18.

13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21~22.

14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138, 139, 146~147, 148~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簡陋乏味，其特殊性由於孔子有鑒於周制崩壞，天下大亂，遂藉魯史示法，展示春秋筆法，如以崩、薨、卒分指不同身分之人的死，以攻、伐、襲來表示戰事的正當與否。這種筆法，表現於屬詞與書法，目的在奉天法周，欲在天下大亂之際，冀使天下有道，恢復固有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故用字遣句之間，以示正邪有別，如王霸之辨；尊卑有別，如為尊者，親者，賢者諱；夷夏有別，如尊夏攘夷。於是傳說孔子作《春秋》，定下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亦即孟子所謂一字之褒，榮若華袞；一字之貶，嚴若斧鉞。後來《春秋》的公羊與穀梁兩傳更大肆宣揚此說。

所謂春秋筆法，也就被認定是儒家史筆。一般人便認為，儒家以意識型態褒貶歷史，也就是西方人認為中國史書為道德指引的由來。其實，中國史學傳統從司馬遷與班固開始，並未使用春秋筆法，直到北宋宋祁、歐陽修撰《新唐書》，忽又講義類凡例，也就是春秋筆法，在字眼上作褒貶，也就是屬詞書法，但並未受到普遍的贊同，也未能取代《舊唐書》，而且當時人吳縝著《新唐書糾謬》一書，指出褒貶必須與事實和文采相結合，而尤以明事實為最要，其所謂糾謬即糾事實之誤。近代章太炎更譏歐陽修曰：「自負上法春秋，於唐本紀大書契丹立晉，為通人所笑，此學春秋而誤也。春秋書法，本不可學」。[15]朱熹《通鑑綱目》最嚴名份，然純以春秋書法為褒貶者，實朱子一人而已。[16]至於正統之論，亦本諸《春秋》，在大一統的觀念下，確定政權的正逆，故一般認為，以儒家的正統觀念，來判定歷史上政權的合法性。正史中陳壽寫的《三國志》就史論史，以曹魏繼漢，司馬晉繼魏，然習鑿齒撰《漢晉春秋》，遵照儒家倫理，取五德相生之說，有晉承漢統之論，以蜀漢為正統，引發正逆的價值爭論，不過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仍繫魏為紀，顯然不能容忍以「論」帶「史」，超然於意識之外。野史小說如《三國演義》反而堅持以蜀漢為正統，充滿儒家倫理意識。所以若將春秋褒貶來概括中國傳統史學，絕不能說是確切。

再說，春秋筆法只是表達倫理意識，並無意歪曲或完全隱藏事實，

15 章太炎，《國學略說》（臺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1974），108。

16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店，1976），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王霸之辨，尊王抑霸，並未欲掩蓋王霸之事跡。若以崩諱君王之死，並未真正掩蓋君王死去之事實。有的諱比較隱密，如書天王狩於河陽，以為天子巡狩，而諱言為晉侯所召。又如魯桓公殺了他的同父異母哥哥隱公，《春秋》書「元年春正月，公即位」，以示桓公參與弒君，故不顧親情，仍然即位。雖為尊者諱，表示道德立場，但沒有抹殺真相，後人仍知天子被晉侯所召以及桓公弒君的事實，可謂諱而不隱。所以，儒家褒貶與善善惡惡，雖然與完全忠實記錄之間有些矛盾，但並不是要使歷史成為道德的教條，而是仍然要儘量書寫真實的歷史，作為道德與治亂的教訓。就此而言，春秋筆法可說是在保存歷史真相的前提下，維護儒家倫理的折衷辦法，或如楊聯陞所謂，史家鼓勵道德而不失尊重實錄之原則（an honest attempt on the part of the historian to encourage morality while respecting the principle of truthful record），[17]最多是干擾了事實的呈現，以至於需要避諱學來解套，既可解套，事實也就不會被淹沒。

## 三、對史官制度的認識與誤解

中國自古就有史官制度，而西方卻無此傳統，故西方史家覺其異而感到特殊與反感。依他們之見，官修代表官方立場，史官為政府所雇用，必具官方的意識型態與偏見，甚且往往有違真實，無從具有個人獨立的觀點與立場。他們並想像皇家任命的史官，享有政治威權，遂漠視無權無勢的大眾，以至於放大官僚體系在因果關係裡的角色到排除其他一切因素的地步。[18]德國漢學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曾說，中國歷代的正史以及司馬光的通鑑，為政府之鑑，根本不允許有獨立的寫作方法。[19]法

17 Lien-sheng Yang,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32.

18 J. Gra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otes on It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186.

19 Herbert Franke,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漢學家白樂知（E. Balazs）逕以「史為官府之用」（L'histoire comme guide de la pratique bureaugratique）為題，發表論文，[20]認為官僚寫史給官僚們看（history was written by officials for officials），並說史官接受俸祿來讚美本朝主子，詆毀前朝。[21]英國史家白德非爾（Herbert Butterfield）也說，歷史寫作在中國，多半官修，由政府組織（bureaucratically organized），由官僚寫給別的官僚看（it was written on the whole by officials for officials），作為做官的指引，故記錄下來的史實即視為真實而客觀，而且一旦成為官史，後人即沿用不疑。[22]根據此說，還有什麼歷史真相可言？官修在他們看來，勢必犧牲歷史的真實性格。

還有更嚴重的說法，澳大利亞的中國通賛訥（W. J. F. Jenner），逕謂「中國歷代史書由官僚所編輯，最有影響力者均由中央政府所編，大致編寫前朝之史，為當前以及未來提供朝代興亡的標準與正確看法。」他更認為，「這些歷史並非根據前朝的原手檔案文獻寫成，而是由原檔案的二手，甚至三手輯錄、摘要與總結編寫。」不僅此也，編寫這些所謂正史的史官，「主要關注的是為皇朝與官僚體系服務」，凡與國家無關者，皆不著錄，「歷史因而成為行政經驗的累積」（the accum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於是當道的官員以及未來的官員，莫不受政府「精心編造歷史」（well-invented past）的「洗腦」（well-inductrinated）。再由於「編寫這些史書的文言文不是拼音文字，故兩千年來的寫作風格幾無變化，史書不論那個時代看起來千篇一律」，令人覺得歷史好像是「沒有時間的」（timeless），更不要說在一

---

Fourteenth Centuries," 131~132.

20 Etienne Balazs, "L'histoire comme guide de la pratique bureaucratique,"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78.

21 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Edited with an Intrucduction by Arthur F. Wright.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132, 135;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4~85.

22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時間中有變化感，甚至覺得「歷史不是過去而是在眼前」（think of the past as something in front of you, not behind you）。那整個文化要中國人「承繼孔子自周初逐漸式微的世界觀」，因此整個國家與文化均「難逃避歷史的威權」（no easy escape from the power of the past），以致於今日的中共仍然是「自家歷史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its own history）。中國的官方史學，無論是儒家還是共黨，都在乎正統政府的合法性，以及道德裁判為史學的核心，支配褒貶。歷史因而扮演了其他文化中宗教經典的角色，而且是定下「最後的裁判」（the Last Judgment）。此一史學傳統使近代中國看不到新事物（blinding her to what was new），並「繼續向中國人的心靈施暴」，故稱之謂「歷史的暴政」（tyrannies of history）。[23]

如此負面的看法，雖不多見，卻頗能反映西方世界對中國傳統史學偏離事實的誤解。贊氏自以為找到中國必將分崩離析的歷史原因，不足深論；在此僅就官修史書的實情，作一敘述。官修史書主要是歷朝的正史，也就是所謂二十四史，近代自梁啟超以來，中國學者在西潮衝擊下，早已有負面的看法，如斥為帝王家譜，只為封建帝王將相樹碑立傳云云。[24]所謂正史體裁，由司馬遷所創，劉知幾稱之為紀傳體，皆由官修。不過，章太炎曾說，前四史實乃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個人所修。但是司馬遷等仍然是史官，只是直到唐代才開始較有組織的官修，並有系統的開始編撰實錄。[25]自《漢書》以後，斷代為史，是朝代的延續而非斷裂；隔代寫史，固然有政治意義，如正統的承繼，但絕非貶前朝以褒今朝，而是為了更為客觀，[26]也就是康熙皇帝曾向史臣所說，「史書永垂後世，關係甚重，必據實秉公，論斷得正，始無偏頗之失，可以傳

23 W. J. F. 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5, 6, 7, 8~9, 10, 11, 12

24 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230。

25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119.

26 Lien-sheng Yang,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信後世」。[27]

官修掌握大量史料，動員政府的力量撰寫歷史；掌握大量的官方文獻，並非僅為狹隘的政治利益服務，其理想仍然是要保存歷史的真相。史官固然有可能在現實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壓力下曲筆，然而曲筆在中國史學傳統裡是一種可恥的敗筆，視為穢史，所遵奉的是直筆，南史董狐為了直筆不惜犧牲性命，一般史官未必能做到，但至少傳為美談，尊為典型。直筆雖可招禍，歷代仍不斷有秉筆直書之史官，即劉知幾所說：「烈士殉名，壯夫重節，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28]西方史家以史官制度而貶低中國史書的真實性，完全忽略了中國史官為了秉筆直書，所表現出來不惜身家性命的烈士性格，更忽略了柳詒徵所謂「史權」，史官雖是政府的官員，然如掌典法，仍有其秉筆直書的權威在，[29]更何況尚有如萬斯同（季野）者，「以布衣參史局，不置銜，不受俸」。[30]這些都可以說明，求真仍是史官莊嚴的職責，未必會為了服務政治而犧牲史職。

史官雖在官府修史，然為了存真，所修不僅可以不讓同僚看，甚至可以不讓皇帝看。自唐朝大規模官修史書以來，就有「天子不觀史」的傳統，目的就是為了不容權勢干擾寫史。固然，唐太宗李世民因殺死兄弟奪取皇位之故，一再要看起居注，不滿意所錄，將玄武門血案比作周公誅管蔡，乃「安社稷，利萬民」之事。此外，許多權貴也會要求史官隱惡，但是不能以若干個別例證，完全否定官修的真實性。[31]事實上，玄武門事件的真相並沒有因一時的隱惡而永遠被掩蓋。此後，宋太祖行

27 劉承幹，《明史例案》（吳興：嘉業堂，1915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線裝影印本），卷1，頁2a。

28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世界書局，1962），93。

29 柳詒徵，《國史要義》（臺北：中華書局，1969），19~35。

30 全祖望，《鮚琦亭集》（一）（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353。

31 黃永年，《舊唐書與新唐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不端，大臣直謂「當由史官書之」，[32]是何等氣概？遼帝出獵，熊虎傷人，要求史官不記，史官不肯，遂說「史官當如是」，[33]又是何等風度？類此美談，固非每一個皇帝與史官所能做到，但是直書其事的求真精神，絕無可疑。明人朱明鎬說，「大凡史官之筆，一字之意，務歸精嚴」，[34]至少是一種信念。西方史學重視求真，也是懸鵠，並非每個史家所能做到。

西方史家認為私修較好，因可獨立於政府掌控之外，但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公私並不容易劃分。西方學者說中國史書乃官員寫給官員看，他們所謂的「官員」（officials）包括在位的以及「準官員」（potential officials），實指所有的士大夫（literati），除了他們之外，誰能寫史或讀史？然則在傳統中國，幾乎沒有與史官理念不同的私人史家。私人所修，所謂野史，諸如雜史，雜記，小說之類，既亦出士人之手，無論觀點或方法，未必異於史官，而私修雖偶有他書不載的可貴記錄，然掌握史料有限，往往道聽塗說，真偽雜揉，整個而言，野史絕不如正史之可信，更遠不如正史之全面與完整。在中國史學史上，若以官私分優劣，很可能得到恰恰相反的結果。

從中國史學史看來，官修傳統也並沒有使中國舊史不辨真偽，缺乏史學意識，認為歷史記錄一成不變的可信。近代中國受到西潮的影響，疑古之風大熾，然而史不可盡信的傳統，絕對是古已有之。上古中國即知闕疑，也就是《論語．為政》所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至崔述撰《考信錄》猶說：「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35]如果不辨真偽，又何必闕疑？中國的寫史者以及讀史者亦未嘗認為史盡可信，明代鍾惺《史懷》鄒序言之尤暢：

聚數千百年之登場者，編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場者，同異之，

32 茅元儀，《青油史漫》（明崇禎刻本），卷一，頁16b。

33 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卷五，頁1449。

34 朱明鎬，《史糾》（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頁3a。

35 崔述，〈考信錄提要卷上〉，《崔東壁遺書》冊1（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頁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即有語言狀貌，誰屬之？即有神情意度，誰記之？而況深謀密記，曖事昧情，跳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鉤描繢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憤發舒，借古人以自寫者居半。忠孝廉節，佞猾姦邪，直榜樣耳；善敗得失，理亂興亡，直梗概耳。[36]

如此史觀，豈能說是讀史不辨真偽？甚至已經達到後現代，史不可能真實的地步，「借古人以自寫」一語，尤見後現代之心態。十九世紀士人郭嵩燾也認為作史者非由親歷，難得曲折本末，若識量不足，據傳聞之詞，臆度得失，則多不足信。[37]然而史不可盡信，並非史無可信。《左傳》已具「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自覺，司馬遷的《史記》雖有增飾渲染，未必信實之處，但已頗知前載不可盡信，傳聞必須裁擇，更能「以哲人析理之真，通於史家求事之實」。[38]可見中國的作史者與讀史者並非以為凡登錄之事，皆為可信，任其以訛傳訛。

因知有不可信與不足信者，故求信乃史家的天職。西方史家動輒認為「中國既不知為史學而史學，也不知為求真而求真」（China knows neither history for history's sake nor truth for truth's sake），[39]若非誤解，則殊為不公。中國歷代史家為求真，為發沉覆，不知花費多少筆墨。即以李心傳《舊聞證誤》一書而言，誠如四庫提要所說，於諸書訛異，多隨事辨正，「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誤，皆一一詳證博引，以折衷其是非」。[40]求真當然未必能遂史家的心願，所謂「盡而不汙」，雖心嚮往之，實不能止，但求直不必盡而已，西方古今史家又何能例外？當代西方史家大都承認歷史之不可能盡信，更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確切真實，後現代學者甚至懷疑重建歷史真相之可能性，未免言之過當。史不可盡信，並不是說史無可信，

---

36 鍾惺，《史懷》（明萬曆刻本），卷十七，頁1a。

37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一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508。

38 錢鍾書，《管錐篇》冊一（北京：中華書局，1979），251~252、319。

39 E. H. Dance, *History for a United World* (London: Harrap, 1971), 87.

40 紀昀，《武英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8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史亦若是。

至於西方史家所謂，在官修之下，中國舊史成為集體創作，機械刻板，殊乏個人色彩，連傳記也如此。德國漢學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認為，依靠政府官俸維生的中國史官，只知採摘和引用文獻，從不知消化文獻，用自己的話來表達，以至於累集了一大堆割裂而無系統的史實。[41]英國漢學家杜希德（D. C. Twitchett）也直言，中國傳統史家雖創作了大量傳記，但一般的列傳像大事記一樣的枯燥而乏人味，使現代讀者很難看到傳主的個性，幾乎為其所屬的社群所埋沒。[42]這種看法在西方史家中相當普遍，如法國漢學家白樂知也說，中國史書既缺少個人色彩，也缺乏一種抽象的想像力，當處理個人的時候，卻把他們視為所屬社群的代表；當處理史實的時候，只是細列事實，一再重複，而無綜合。[43]

西方史家崇尚專家著述，然而中國正史正是要集體創作，《明史例案》有言，「修史與專家著述不同；專家著述可據一人之私見，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評，未可用意見肆譏彈也」。[44]西方史家較深入研究中國傳統史學，便知所謂列傳，原非西方世界所謂之傳記，並無意描述傳主的一生，而只述其與整體相關之一部份。[45]中西兩端意趣迥異，殊不可一概而論。中國傳統史書，以現代眼光視之，固有嚴重的缺點，然亦有其特色，應有正確的認識，容在下一節討論。

## 四、對中國傳統史書的認識與誤解

41 Herbert Franke,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129~133.

42 Denis Twitchett,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113~114.

43 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Edited with an Intrucduction by Arthur F. Wright,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129.

44 劉承幹，《明史例案》，卷4，頁3a。

45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方史學界普遍認為，儒家史學既旨在為道德服務，其目的在此而不在彼，故有史而無學。沒有史學觀念的中國史學，只能收集與編排史料，缺少辨別真偽的能力；只知編年，而殊乏綜合與解釋的技藝，以至於史學意識停留在相當低的層次。像一本相當有名的史學入門書所說，「史學在東方，甚至在古希臘，不過是一堆無可索解的往事」；[46]中國的《尚書》，《春秋》之類，只不過是「真歷史的原料」（materials for a true history）；[47]中國自古雖有大量的史書，但盡是朝代興廢的編年，「殊少審思歷史的性質與意義」（little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history）。[48]

然而說中國史學不發達，而史料特別豐富，幾乎保存了完整的歷史紀錄（China has the most nearly complete historical records left by any civilization），[49]亦不很確實。中國史書浩繁，確實「沒有其他古國擁有如此眾多，如此持續，如此正確的歷史紀錄」（No other ancient nation possesses records of its whole past so voluminous, so continuous, or so accurate）。[50]這種說法其實是貶詞，因為沒有史學，所以所謂史書只有原料的堆砌，二十四史也都成了原料。[51]其實，照西方的概念，史料分原手（primary sources）與二手（secondary sources），像二十四史絕非原手史料，而是二手史書。評價二十四史須以史書的標準，若以史料的標準，只能算是次料。中國所具備的第一手史料，並不充沛，更不能說是完整的紀錄。現代中國學者在西方的影響下，遂欲擴充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地下出土的考古資料。所謂不讀二十四史的說法，乃不當它作原料讀也。斯乃史料與史書概念的釐清，並不是羅志田所說的什麼「詭

46 Allan Nevins, *The Gateway to Histo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2), 14.

47 Barzun J. and Graff, H. 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Harbinger Book, 1970), 47.

48 A. G. Widgery,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From Confucius to Toynbee,* 15.

49 T. W. Wallband and A. M. Taylor, *Civil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Scott, Foresman, & Co., 1949), 110.

50 Charles S. Gardner,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05.

51 Wager T. Swingle,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6 (Oct.- July, 1920-1921), 7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52]

認定中國史書只是編排史料，大多來自對中國史書的粗淺印象。西方漢學家們雖特別稱道中國歷史文書之富，但也認為在方法上粗疏嚴重，所謂史書只不過是機械的用剪刀與漿糊剪貼而成，對史料的取捨缺乏批判的眼光。最近還有美國學者侯格睿（Grant Hardy）批評司馬遷的《史記》「像一部沒有完成，未經整理，有點失控的史書；司馬遷似乎像一個沒有頭腦的抄寫者，他不加區別的亂抄亂寫，自相矛盾，缺少編修史書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控制力的感覺」。[53]就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西方史家看來，也只是一部了不起的編年紀而已，並不能說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史書。[54]其實，這種認識與把中國史書視為道德指引是相矛盾的；如果僅是史料編排，又如何指引道德？史料編排即所謂「剪貼式的史書」（scissors-and-paste historical method），然並非英哲柯林吾（R. G. Collingwood）之所謂；柯氏認為凡非經史家心造之史（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55]均如剪貼，則西方傳統史書非剪貼者又幾希？而是指中國傳統史書仍然停留在極為簡陋的剪刀漿糊的剪貼層次。

中國傳統史籍的體裁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大類，其中紀事本末雖較符合西方史家的書寫方式，但仍被認為是史料的堆積，因果本末並未能清楚交代，至於編年，則猶如王安石所謂「斷爛朝報」，不堪卒讀；而紀傳分割，不能一氣呵成，也難以閱讀，自然產生簡單史實編排的印象。

中國的紀傳體原是史書體裁的一種，目的就是藉人觀事，藉傳述史。帝王的本紀，與西方的帝王傳記有別，鮮及帝王的私生活，絕非帝王家譜，實是以帝王為首的國家大事編年，保存了一個朝代史事的進展

52 羅志田，〈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266期（2000年8月15日），151~167。

53 侯格睿，〈文本中的世界：司馬遷的史記〉，收入魏格林、施耐德主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99。

54 Edwin 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135, 158.

55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82, 2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全貌。列傳原是各社群裡的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不僅包括皇子、后妃、宦官、外戚、循吏、酷吏，而且包括忠義、孝友、儒林、文苑、方技、隱逸，以及烈女、貨殖、四夷，甚至遊俠等，包攬甚廣，也可說是某一社群裡的模範（role models），能由「模範」見整個社群，正是列傳所要達到之目的，顯然與西方所謂的個人傳記，大異其趣。列傳固有其特殊功能，卻不能代表傳記寫作的全面。中國傳記寫作的懸鵠仍是人物的傳真，甚至傳神，司馬遷刻劃項羽之生動，有目共睹；項羽的個性，在其本紀中豈非十分凸出。凡中國歷史上著名或重要人物，在眾多的詩文集中，多有突出個性的刻劃。尤其在大量的詠史詩之中，歷代名人不斷是吟詠的對象，時有入木三分的傳神之作。傳統中國固然缺少近代西方鉅細靡遺，歷歷如繪的大傳記作品，但不應以正史列傳來概括中國固有的傳記，並論斷其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而無個性。

紀傳體除了本紀與列傳之外，尚有志與表。志，分類記述各種典章制度，除了政經、法令、職官、軍事外，亦記述天文、地理、曆法、圖書等，保存了有關國計民生更廣泛的面相；表，則是提供查閱史事的方便，如《新唐書》裡的宰相表，按年標出宰相的任免，方鎮表列出節度使管區的分合。西方學者總覺得這種體裁是「一種奇怪的安排」（something of the peculiar arrangement），[56]讀起來很散亂，掌握不著史事的整體發展，難以適應本紀是「綱」，志表傳乃是「目」之讀法。然而在中國傳統史學環境成長的龔自珍，「自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57]顯然無礙他在史藉中看到變化。傳統的各種紀年，當然也使外國人頭昏目眩，看不見時間的連續發展；干支幾年也使西方學者誤認為是一種循環史觀，六十年週而復始。歷史哪裡會每六十年就回到原點呢？

正史的斷代性格也使西方史家只有斷裂感而無演進感，其實二十四史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提供了無可替代的骨幹，即使近代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只能補正史之不足，絕不可能自成信史系統。如黃永年所說，

56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107.

57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翻印本），3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唐史仍有賴於正史中的新舊唐書，現代中國著名史家呂思勉與陳寅恪都不例外。[58]更何況兩千餘年正史的編寫累積了不少經驗，在史學方法上也有進展，修到第二十四史的明史時，已歸納出足令現代史家喝采的幾條：「搜採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直，持論欲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59]若一味論定正史為政權服務者，不免忽略了正史在史學上的執著及其難以磨滅的貢獻。

以中國傳統史籍之浩繁，必有不少只是堆積史料或史實的作品，甚至輾轉傳鈔，錯誤百出者，然而絕不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範式。劉知幾所標示的才、學、識，才是中國史家遵奉的典範。除了博學之外，尚須具備寫史的才華，不僅要有文采，更要有識力洞察史事，若僅編排史事又何須史才與史識？鄭樵所謂「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60]乃是中國作史者的自期。著名紀傳體如《史記》，編年體如《左傳》，《資治通鑑》，皆具大敘事史之風範，與西方大敘事史相較，並不遜色。近代西方史學曾經一度不屑於敘事，講求分析與量化，讀如科學報告，枯燥乏味，絕非史學之指歸，敘事史於晚近西方重新被重視，實勢所必然。

西方史學界既認為中國史籍乃事實的堆砌，故對其敘事之要義，基本上不予追究，無視杜預《左傳正義》所拈出的「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五例。此五例，乃中國傳統史學心想神往的楷模與懸鵠，道出敘事的理想方法和境界。然微、晦、婉諸旨，卻非中國文化圈外人所易通曉。即使漢學家蒲立本也覺得，劉知幾言省，雖是中國文字表達的一貫技巧，然就歷史寫作而言，其效果就可疑了。[61]其實，微與顯，晦與志，似相反實相成。史筆固應寫得清楚明白，然亦須講求省字約文，意在言外，望表知裏，捫毛辨骨，所以微與晦並無損於顯，反而可以顯得更好更美，使其婉而成章，毋寧是高超的歷史寫作技巧。如果只是整理史料，編排史實，則又何必講究如

58 黃永年，《舊唐書與新唐書》，7。

59 劉承幹，《明史例案》，卷4，頁6b。

60 鄭樵，〈通志總序〉，《通志》冊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

61 Edwin 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1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奧妙的寫作技巧？這種相反相成的寫作技巧，顯然不為近代西方史家所取，阿姆斯壯（Edward Armstrong）提到，近代史學之父「蘭克的寫作風格一清如水，亦如水之無味」（If Ranke's style was as transparent as water, it was said, it was also as tasteless）。[62]中西意趣，可見之矣。

西方學者對中國重要史著作過深入研究後，方知並非剪刀漿糊的成品。杜鬲（Stephen Durrant）專門研究太史公書，發現司馬遷描寫人物之深刻，如對項羽與劉邦以及鴻門宴的精彩描述，譽之為文學奇才，把歷史寫的像故事一樣。[63]不過，他仍認為司馬遷以孔子為典範，想包攬過去的一切，以至於無法在歷史裡找到清晰又一致的意義，[64]整個佈局顯得零碎。此外，他的歷史敘述與哲學思維之間有矛盾，如在意識型態上認為天與善人，但在實際上非必如此；在意識型態上天命屬於仁義，但在實際上非必如此，以致於造成許多「緊張」（tension）與「衝突」（conflict）。太史公想寫理想的故事，以致於無法真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位學者認為，司馬遷寫史，捲入太多自身的經驗與情緒，因而不似羅馬史家塔西圖斯（Tacitus）之客觀與以理性寫史。所以若以史為鏡，司馬遷提供的鏡子畢竟是扭曲而模糊的（the cloudy mirror）。[65]

杜鬲的分析，下過一番功夫，提出自己的解釋，然而他把天人之際的際，理解為「邊界」（boundary），把一家之言理解為追求「統一的學派」（the coherent single school），把太史公之奇，理解為好奇（curiosity），顯然有誤差。司馬遷欲在史學園地中自成一家之言，並不追求統一和諧的哲學系統。

---

62 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trans. G. R. Dennis. Introduction by Edward Armstrong (London: Bell and Sons, 1915), x.

63 Stephen W. Durrant,.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143.

64 Stephen W. Durrant,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123.

65 Stephen W. Durrant,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中國傳統史學的寫作是一種分工的方法。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只是敘事類，尚有別史、雜史、史評、史考等等。此外，歷代學者的文集或筆記中，還有不少評史、考史之作。司馬光的《通鑑》除以臣光曰表達主見供皇帝參考外，直敘史事，不加評論，連考訂部分也另成《考異》一書，好像僅是史實的編排，然而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則盡是針對通鑑敘事的議論，頗有系統評述了自嬴秦到五代之間的歷史人物、思想與事件，充分表達了他的史觀與思想趨向。他固然強調以史為鑑的重要，但也一再肯定歷史信實公正的必要，並得出歷史的進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從而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觀，具體的例子如分析了秦始皇立郡縣廢封建之必然，所謂「勢相激而理隨以易」。由此可見，事與論分見於兩書，固不能說中國傳統史學有事而無論。《通鑑》臣光曰多儒家道德語，而《讀通鑑論》多批評宋儒語，自亦不能逕謂中國史學盡為儒家道德服務。同樣，《左傳》編年敘事，而呂祖謙的左氏三書，《左氏傳說》、《左氏傳續說》、《左氏東萊博議》則據事引論，大演歷史興衰之論，並指出欲觀興衰，須得「統體」（從整個歷史發展來看），掌握「機括」（興衰的關鍵因素）。[66]東萊解釋一國之興衰，一代的升降，固有其不出儒家之理的主見，然西方大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述論羅馬衰亡史，亦有其十八世紀理性主義之主見，總不能只見一部分的編年史，驟謂中國傳統史學只有編書，而無解釋。

釋史、評史、考史之作，在中國史學史裡，往往單行，或分見於文集。除《史通》、《文史通議》之外，如葛洪《涉史隨筆》，「取歷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修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67]呂夏卿《唐書直筆》，論史書的體例與取捨；[68]洪邁《容齋隨筆》取唐平蠻碑，確證內監掌兵權，始於唐明皇；郭大有《評史心見》議論最多；朱明鎬《史糾》，糾三國以後諸史；鍾惺《史懷》隱括正史，觀

66 吳懷祺，《宋代史學思想史》（合肥：黃山書社，1992），206~215。

67 葛洪，《涉史隨筆》（明弘治刻本），頁1。

68 呂夏卿，《唐書直筆》（1981年清南昌彭氏知聖道齋抄本），卷1，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今之意，「借古人之天下而發其蘊」；[69]于慎行《讀史漫錄》考古今郡縣大小，發現古今史事既有異情同形者，也有同事而異功者，饒具史識；茅元儀《青油史漫》，漫論舊史；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與《諸史拾遺》，頗糾正史之謬。類此史籍，所在多見，不宜只見若干編年記事之樹，而不見茂密史林之全。葛洪讀史自遣一語，亦足破西人所謂，中國從來沒有像西方一樣，把歷史作為「消遣」（pastime）的說法。[70]

## 五、結語

中國傳統史學以現代眼光視之，自有不少缺點，西方史家基本上正以近代西方史學的標準來評論中國的舊史學。此一不適當的比較觀與西方史家對西方史學的強烈自信，以及對中國傳統史學認識的淺顯，很容易作出未經細察的綜述和結論。大致而言，他們認為中國史學受到儒教的深切影響，把重點放在褒貶上，淪為道德工具，而歷代中央政權僱用史官，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又淪為政治工具，以致於沒有獨立的史學意識，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滯在編排與剪貼的層次。

本文即旨在針對西方史家片面認識作些商榷，並指出誤解之所在。然而同時應該指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的偏見與誤解也多少由於現代中國史家並未稱職。一方面，在西風吹襲和革命浪潮衝擊下，輕易詆毀甚至揚棄中國傳統史學；另一方面，由於不夠重視，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仍然不夠深入與全面，以致於中國史學的真面目尚未完全呈現出來。儒家對中國史學的關係到底如何，也沒有完整而仔細的研究。西方史家看不清廬山真面目，只恐廬山仍在雲霧飄緲間。

---

69 鍾惺，《史懷》，頁2a~2b。

70 E. H. Dance, *History for a United World* (London: Harrap, 1971),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徵引書目

## 中文論著

卜大有，《史學要義》，明萬曆刻本。
于慎行，《讀史漫錄》，濟南：齊魯書社，1996。
王夫之，《宋論》，北京：中華書局，1964。
———，《讀通鑑論》（共三冊），臺北：中華書局，1971。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共二冊），臺北；廣文書局，1971。
全祖望，《鮚琦亭集》（共二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朱明鎬，《史糾》，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
吳懷祺，《宋代史學思想史》，合肥：黃山書社，1992。
呂夏卿，《唐書直筆》，清南昌彭氏知聖道齋抄本，1981。
呂祖謙，《東萊博議》，上海：致新書局線裝本，1924。
李心傳，《舊文證誤》，北京：中華書局，1981。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227~236。
———，《史傳通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
金毓紱，《中國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62。
侯格睿，〈文本中的世界：司馬遷的史記〉，收入魏格林，施耐德主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
柳詒徵，《國史要義》，臺北：中華書局，1969。
紀　昀，《武英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
茅元儀，《青油史漫》（共二卷），明崇禎刻本。
崔　述，〈考信錄提要卷上〉，《崔東壁遺書》冊1，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脫　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
郭大有，《評史心見》，十二卷，明萬曆十四年刻本，1586。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一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陳　垣，《史諱舉例》，北京：中華書局，1962。
章太炎，《國學略說》，臺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1974。
章學誠，《章氏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黃永年，《舊唐書與新唐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葛　洪，《涉史隨筆》一卷，明弘治刻本。
劉承幹，《明史例案》，吳興：嘉業堂，1915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線裝影印本。
劉知幾，《史通通釋》，浦起龍釋，臺北：世界書局，19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鄭 樵，〈通志總序〉，《通志》（共三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錢大昕，《諸史拾遺》（共五卷），嘉慶十二年嘉興郡齋版。
錢鍾書，《管錐篇》（共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
鍾 惺，《史懷》（共十七卷），明萬曆刻本。
羅志田，〈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266 期，2000 年 8 月 15 日，151~167。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店，1976。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翻印本，1975。

## 英文論著

Balazs, Etienne. "L'histoire comme guide de la pratique bureaucratique."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78~94.

Balazs, Etienn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thur F. Wright,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Barraclough, Geoffrey.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Blackwell, 1962.

Barzun, J. and Graff, H. 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Harbinger Book, 1962.

Beasley, W. G. and Pulleyblank, E. 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Butterfield, Herbert.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in *Listener* 21 September 1961.

Butterfield, Herbert. *The Origins of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Collingwood, R. G.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Dance, E. H. *History for a United World*. London: Harrap, 1971.

Durrant, Stephen W.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Elton, G. R.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Crowell Co., 1967.

Finberg, H. P. R. ed. *Approaches to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62.

Franke, Herbert.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d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5~134.

Gardner, Charles S.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Gottschalk, Louis ed. *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Gray, J. "Historic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otes on It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86~212.

Ho, Ping-ti,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Jenner, W. J. F.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nguin Books, 1992.
Lewis, Mark Edward.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Lukacs, Joh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Remembered Past*.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Book, 1994.
Nevins, Allan. *The Gateway to Histo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2.
Plumb, J. H. *The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69.
Pritchard, Earl H.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Local Histories." in Hayden V. White ed. *The Uses of History: Essays i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Detrio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ulleyblank, Edwin G.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 1955.
Pulleyblank, Edwin G.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35~166.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in Raymond Dawson ed. *The Legacy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43~164.
Ranke, Leopold von.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trans. G. R. Dennis, Introduction by Edward Armstrong. London: Bell and Sons, 1915.
Swingle, Wager T.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6 (Oct.- July 1920~1921), 717~725.
Twitchett, Denis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95~114.
Twitchett, Denis.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Wallband, T. W. and Taylor, A. M. *Civil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Scott, Foresman, & Co. 1949.
Watson, Burt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Widgery, A. G.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From Confucius to Toynbe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1.
Yang, Lien-sheng.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44~59.

（責任編輯：蔡宗憲　校對：張季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st

Young-tsu Wong

## Abstract

Prominent historians in the West, including some distinguished China specialists, often label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which they consider a history written by officials for officials and a virtual moral tool to serve political purposes. In this judgment, as many Western historians claim, the Chinese knew nothing of objectiv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But, this judgment, it seems, is based on an ethnocentric prejudice without looking in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a whole in any dept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st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ers, with a few exceptions, such as Ouyang Xiu and Zhu Xi, never wrote their history in the mold of Confucian morality, known as the "Annals style" (春秋筆法). Even the Annals style, while encouraging morality, still made an honest attempt to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truthful record.

Nor does it seem fair to denounce the officially commissioned historical writings, known as "standard history" (正史), as the means for passing moral judgments and, even worse, serving state propaganda. In fact, organized historical writ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bureau began from Tang China (618-907), and the "standard histories" prior to Tang, including the works of Sima Qian, Ban Gu, and Chen Shou, were written by private hands with access to state records. The so-called "standard histories," twenty-four of them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follow dynastic order, actuall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present better work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official historians, though employed by government, were not all dutifully bound to follow the state line. Quite a few of them showed remarkable courage in maintaining their intellectual integrity, and most of them upheld the principle of truth seeking. Moreover, the state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factual truthfulness and preventing political interference set the famous rule that even the emperor himself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ad the contemporary events recorded by official historians. Even though not every emperor could be restrained, the tradition nonetheless had been cherish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private individuals who had little access, if any, to historical sources could produce only less accurate "coarse history" （野史）.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ficial histories were normally better written than private histories.

Still another Western misconception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ans knew nothing more than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 raw historical sourc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distinguished historiographer Liu Zhiji of the Tang had set the high standard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ans: skills, erudition, and insight.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and criticism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rsonalities can be found in numerous monographic works; other than standard histories, which are mainly chronological and narrative with little authorial opinions.

With all its shortcomings,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gives due respect to historical truth and objectivity. Like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however, they could not always meet the standards that they had set for themselves.

Keywords: Western historians, misconception of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